

人口、制度变迁与工业化模式的新思考

——兼论我国“人力资本推动下的制度创新增长模式”的形成机理*

张佑林

(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 本文将人口、制度变迁与工业化三个经济变量有机地结合起来, 说明人口压力是制度创新的动力。正是在以大批企业家为主体的“人力资本”的推动下, 形成了改革开放后我国东部沿海制度创新的浪潮, 加快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提出了“人力资本推动下的制度创新增长”新模式, 并主要对其形成机理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 人力资本; 制度变迁; 创新精神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5)01-0079-05

作者简介: 张佑林(1964-), 男, 湖南永顺人, 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一、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与人口、工业化水平的实证分析

人口数量与工业化是什么关系? 人口数量如何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这一问题自从马尔萨斯《人口论》发表以来, 就充满着争论。传统的看法是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是负相关的, 即人口过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近年来学术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 即人口数量并不必然阻碍经济的发展, 相反, 如果适应经济需要, 它可能还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在现代工业社会, 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 二战以后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工业化与人口密度是呈正相关的。即在控制了一系列其他变量的条件下, 人口密度越大, 工业化水平越高, 经济增长越快。从世界范围看, 在过去 50 年间, 世界人口翻了一番多, 然而世界上的人口在衣、食、住等方面上的生活状况

却得到了改善, 人们的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有充分证据表明, 人口增长没有导致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降低, 即使在世界人口达到并超过 60 亿之后也没有发生。相反, 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西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却是世界经济最发达、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我国人口密度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呈典型正相关的。1935 年, 中国著名的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提出了“爱辉—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 这条分界线东南部分面积占全国的 36%, 人口却占全国的 96%; 分界线西北部分面积占全国的 64%, 人口却仅占全国的 4%。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我国目前的人口分布情况与那时几乎没有区别。根据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省区大部分在东南部地区。按常规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划分, 东部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452 人, 比中部地区(每平方公里 262 人)高 73%, 比西部地区(每平方公里 51 人)高 7.8

* 收稿日期: 2004-08-12

倍。从一些代表性省份来看,上海人口密度全国最高,为每平方公里 2657 人,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人口密度较高的省区也大都分布在我国东部地区;西藏是我国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每平方公里只有 2.1 人,其他如新疆、青海、甘肃等省的人口密度都不足 100 人,且都分布在西部地区。对 2000 年各省、市、自治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口密度进行等级相关分析,得出的相关系数为 0.867,即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得出,1999 年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41.4%,国内生产总值却占全国的 58.8%,大专以上人口占全国的 50%;中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45.1%,大专以上人口占全国的 38.5%;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13.8%,大专以上人口占全国的 11.4%。由此可见,我国的人口数量也是与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呈正相关的。

二、人力资源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综述

人口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统一,作为生产力,人口增长通过影响劳动力、资本形成和技术进步从供给方面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作为消费力,人口增长通过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从需求方面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21 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社会正在经历“从金融资本到人力资本的”的转变,物质资本依托型的经济正在让位于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人力资本成为最具活力、最能创造经济奇迹的资本。

1. 人口数量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

首先,人口的增加可以导致知识总量的增加。有充分证据表明,在较长的时期内,人口增长对近两个世纪里知识总量的快速增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世界人口增长从两个方面促进了知识总量的增加。第一,人口越多,人口密度越大,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因此,随着人口的增加,把时间和精力投放于知识创新的动力也会增加。第二,人口越多,能够从事发明创造、对人类知识总量做出贡献的人就越多。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这就使我们得以提高资源的生产能力,并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

其次,人口数量的增加还会产生市场效应。人

口的持续快速增长有利于增加企业家对未来的乐观预期,激发更多的投资活动。从长远看,经济的增长以人口的增长为必要条件,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一定规模的市场,因为市场的繁荣离不开人口的集聚效应。因此,最低限度的人口数量及其密度总是经济活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信息容易集中和传播,运输和交易成本也会大大降低,规模经济效率更容易发挥,从而也就越容易形成市场。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迅速地形成了市场,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却迟迟不能形成有效的市场;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国东部人口稠密地区也是市场最发达的地区,而地广人稀的西部地区,市场的发育程度却相对滞后。此外,人口的数量还有利于克服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避免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市场日趋饱和,竞争日趋激烈,传统产品出口压力增大,在全球性经济衰退日益凸现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基本战略,而实现这个战略的前提是保持较大规模的人口数量。我国近年来之所以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911 事件”的冲击下,在国际市场不景气、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其关键因素就在于我国政府立足于 13 亿这个庞大的人口消费市场,实行了连续多年扩大内需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始终使我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 7% 以上的高水平,顺利度过了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冲击。

2. 人口质量与工业化的关系

人口概念不单单是一个数量概论,还包含着质量、结构等多方面的内容。不仅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也通过对生产方式、消费结构的改变影响到经济增长。一国的人口质量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所占人口的比例体现出来。一般来说,人力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体所具有的一切劳动能力的总和,它包括自然力和人力资本两部分,所谓自然力是指那些未受过任何系统性教育和培训的劳动者,如文盲或一般的体力劳动者;而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培训而形成的具有某方面专长的高素质劳动者,如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和技术人员等。如果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人力资源的作用作一种全面的考察,可以说,在生产水平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资源是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数量,自

然人力对自然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在经济活动中技术知识含量不断提高的今天,机器、微电子以及自动化技术等高科技已从各个方面形成了对人的体力的直接代替,人口身体素质对地区经济发展原有的决定性作用已逐渐为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因素所取代,人口文化素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变得越来越明显。

具体来说,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现代社会,人力资本作为生产的主体,是首要的生产力。人力资本可以在外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根据自身条件和愿望有目的地应用各种要素进行活动。只有有了人力资本的创造性劳动,各种自然资源才会成为经济资源,才能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现实的生产要素;同时,只有有了高智能的人类,各种经济资源才会得到深层次的开发和充分的利用,从而发挥更大效益。其次,人力资本有效益递增的优点。在技术系数不变的条件下,生产中的某一物质要素投入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收益递减之势。但是,人力资本是一种能动的“活”的智力资源,其使用过程本身就是知识增加、经验积累、智力开发和个性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质量会更进一步得到提高。这样,它不仅会提高自身的边际生产率,而且会提高物质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从而提高整个生产过程的收益率。再次,人力资本具有资源替代作用。人力资本是一切资源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特殊资源,充分开发人力资源,发挥人的效用,不仅能够开发自然资源,而且能够创造出新的物质资源;相反,自然资源再丰富,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人去开发,只能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而不能成为现实的优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告诉我们,自然资源的优势不是真正的优势,人力资本的优势才是真正的优势;自然资源优势不能替代人力资源优势,而人力资源优势可以替代自然资源优势,弥补自然资源的不足。第四,人力资本是一种乘数资源。它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它具有吸引、集聚各种资源的功能,从而以其为核心形成一个合理的资源集团或资源流,充分发挥资源的规模效应。

三、我国工业化模式形成的路径特点:“人力资本推动下的制度创新增长模式”的形成机理

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是通过制度的创新和变迁而逐步实现的。制度创新同技术创新一样,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基本源泉。制度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正式制度,即经济、法律、政治等方面的成文制度,二是非正式制度,指观念、风俗、习惯、文化等因素。制度是从非正式制度演化而来的,而非正式制度来自于民间的创造。制度在一开始往往是不合法的、违规的,从非正式制度的民间突破到正式制度的官方确立,是一个互动式制度变迁的过程。这种来自于民间的制度往往是自然演进的制度创新,它可以充分地吸收来自于不同的主体的信息和知识。本文所提出的“人力资源推动下的制度创新”可以说是自下而上的内生型的非正式制度创新与变迁。

1. 人力资本推动下的制度创新增长模式”的内动力:人口数量的压力

中国是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且大部分集中在缺乏自然资源的沿海地区。传统农业人地矛盾异常尖锐。以浙江省为例,浙江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省份,传统农业的突出矛盾是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 0.6 亩,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48%。而农村人口则多达 3300 万,农村劳动力之多多大大超过土地的承载力。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释放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急需寻找出路。但在传统的农业发展社会,经营范围狭窄,开发层次低,生产率发展水平不高。一方面,农业不能有效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加以吸收;另一方面,城市发展的落后状态又不能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空间。这样,通过农地制度改革而得以释放出来的大量隐性失业人口,唯一的选择就是开辟农业之外的生产层次。因此,增加生产的层次,尤其是寻求与农业既相区别,又在原料区位上密切相关的非农产业,便成为我国传统农业社会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由此可见,中国的改革首先是现代传统农业人地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是被农民的饥饿逼出来的。因此,农村的制度创新就自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中国农村的改革,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由农民自发创造的,农民是农村改革的真正主体和创造者。

2. 企业家及其创新精神是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人口压力转化为经济动力的社会机制力量变得强大起来,正是在以企业家

为核心的人力资本的作用下,形成了我国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浪潮。

什么是企业家?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按照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是把实现新的生产方法组合作为自己职能的人,是创新的主体,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就是“企业家精神”。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其主要含义是:(1)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和甘冒风险的大无畏精神;(2)企业家的“成功欲”;(3)企业家甘冒风险、以苦为乐的精神;(4)企业家的精明理智和敏捷;(5)企业家的事业心。由此可见,企业家本身的素质决定了他自始至终是实施创新的人,他们具有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竞争精神,能够大胆地进行技术和制度创新。正是由于他们的作用,不仅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而且能够通过其影响而产生一批追随、模仿创新企业的新企业和具有创新能力的人,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经济从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中摆脱出来,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进化。因此,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正是一个地区经济能否起飞的关键,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是创新的精髓,他们也是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因素。

以东部的浙江省为例,2000年,全省共有城镇私营、个体从业人员207.7万人,在这些企业经营者中,具有高级职称或大专以上学历的高素质企业家人数,已占到三分之一左右。正是他们创造了以乡镇企业为主的数十万家民间企业,从而有效地融合了当地的人力资源、资本和其它稀缺的生产要素,推动了浙江经济的迅速发展。以民间企业为主体的举世闻名的“温州模式”,正是温州数十万民间企业家勇于制度创新的杰作。而反观我国西部地区,由于企业家的极端稀缺,使得西部民间企业的发展失去了开拓者和带头人,因而难以发展壮大。据有关资料统计,1997年,在全国乡镇企业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84万人。其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有54万人,占全国的64.3%;分布在中部地区乡镇企业的有25万人,占全国的29.7%;分布在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仅5万人,占全国的6%。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10.8倍。正是由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尤其是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的极端缺乏,才造成了西部地区民间企业和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

3.“人力资本推动下的制度创新增长模式”的
形成路径:自下而上的民间工业基础上的工业化道路

从制度变迁的类型来看,主要包括两种形式:

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生首先是因为有外在利润的存在,即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其次,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有一个新制度安排的“创造者”自发组织实施。一个社会的制度变迁是否发生,不仅取决于参与制度创新主体对制度创新成本—收益或损益的主观评价,而且取决于他们的判断能力和适应效率。也即一个社会只有存在一个具有强烈的创新动机和准确的判断能力而能不断捕捉新的潜在获利机会的企业家群体时,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才会发生并不断持续下去。

从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和我国沿海典型的工业化道路来看,其制度创新基本上是诱致性的制度创新,即它的形成主要不是由于外部力量的强制性作用,而是群众主要是企业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自愿选择,然后政府加以引导与规范的结果。这是一条源自于农村的由乡村工业所推进的工业化道路。笔者把这种源自于民间的工业化道路概括为“非常规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业化道路,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从工业化的主体来看,是民间工业发展壮大并逐渐包围和促进城市工业的过程。东部经济的高增长,大部分体现在农村工业的高速发展中,农村工业的比重大大超过了城市工业的比重。第二,从所有制结构来看,是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逐渐成长并冲击国有大工业的过程。东部的工业化过程,是一个国有工业份额不断下降而民间工业不断上升的过程。第三,从市场的发展来看,是农村的大批专业市场逐渐代替城市商品市场的过程,从而呈现出与典型的城市大而全的商品市场不相符的分散化、专业化的市场特点。第四,从城市化的发展来看,是数量众多的农村小城镇逐渐包围大中城市的过程,小城镇吸纳了绝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提高城市化水平的主力军,并且直接减轻了大城市的人口压力。第五,从主导产业的构成来看,产业结构是以轻工业和加工业为主,而散布在广大农村地区的以劳动密集型为特色的乡镇企业则构成了其主体,广大城市的同类型企业反而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从而迫使城市大工业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寻找新的发展出路。第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来看,市场化进程对于

经济增长的推进效应,集中表现在农村工业依靠体制外的先发性改革,率先进入市场系统参与竞争和资源配置,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而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城市因受到计划经济的束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结果是落后的农村地区反而先于发达的城市地区实现了体制的转型,并最终成为城市模仿和学习的榜样。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推动下的制度创新增长模式”的核心是自发的和内生的经济发展,其形成机理是: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尤其是那些人口众多的农村地区,在我国改革开放后,转移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更是面临着生存竞争的压力。在人地矛盾已使传统农业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只得另谋它业。但由于文化背景和观念不同所造成的人口素质差异,促使人们做出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以传统保守文化背景为主体的的人群,要么安于现状,坐等无为;要么外出打工,沦为廉价劳动力。而以海派功利文化为主体的的人群,则不甘贫穷,敢于竞争,突破传统农业的桎梏,涉足全新的工业产业和其它现代领域,勇于创新,依靠发展民间乡村工业和相关产业,实现了我国农村经济组织结构历史性的制度变迁,最终实现了农村的工业化。改革开放后我国涌现出来的最著名的三大工业化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

式”以及“珠江模式”,其形成路径均符合此规律。这种模式的本质是一种“自组织模式”,在市场竞争当中,私人企业家进行不断地模仿和创新,实现创造性的毁灭,推动经济的发展。这种起源于民间的乡村工业组织明显地处于“正式”经济体系之外。民间活动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主体,民间的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由农村到城市,由小工业代替农业并逐渐向大工业过渡的过程,因而是一种非常规的工业化道路。这是一条起源于农村,然后向中小城镇迅速集中,即“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业化之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广大农村地区民间工业的大发展,便没有我国制度变迁的实现,便没有我国二元社会向一元经济的成功转化,便没有我国农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最终成功。

参考文献:

- [1] Theodore Schultz. Investing in People of Population Quality [M]. 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
- [2] 西奥多·舒尔茨. 对人进行投资 [M]. 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
- [3]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4] 祁茗田,等. 文化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 [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Ponderation on Population, System Changes and the Model of Industrialization

—A Concurrent Talk About the Shaping Mechanism on System Innovation Increasing Model Pushed by Manpower Capital

ZHANG You-lin

(Economics and Trade Depart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2,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connects population, system alteration with industrialization, It points out that population pressure is the power to system creation. It is just pushed by manpower capital with the mass enterprisers as the main body, and forms the waves of system innovation taking shape in the southeast seashore of our country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up, which speeds up our industrialization. The article poses the new model on system innovation increasing model pushed by manpower capital and studies mainly its forming mechanism.

Key words: manpower capital; system changes; initiative spirit